

武昌起义后有关“首义”的历史记忆

苏全有,李飞涛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1910年代“共和”是时代的潮流,有关“首义”的报道依时间顺序依次为武昌起义、云南首义、马厂首义,首义的归属不具有指向性。1920年代之后有关武昌首义的报道升至首位,延续至80年代,云南首义在20-40年代与武昌首义相伴随,作为国家纪念日延续到40年代,马厂首义则仅见于20年代初期,武昌首义地位凸显。新中国成立后,武昌首义的报道占据主导地位,云南起义与马厂誓师则湮没不闻。整体来看,从舆论界对“首义”的报道变化中,可以看出武昌首义的地位历经了1910年代的首义“之一”,20-40年代的首义“第一”及之后的首义“唯一”的变化。

关键词:首义;武昌起义;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23)02-0074-10

DOI:10.16140/j.cnki.ydxk.2023.02.014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将“首义”一词与武昌首义相联系,对武昌首义之外的“首义”缺乏关注。在学术界,对于“首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武昌首义相关的人物研究^①、弘扬辛亥武昌首义精神^②、武昌首义史建设^③、武昌首义与现代化研究^④等方面,冯天瑜之文《“辛亥武昌首义”名辨》^⑤虽触及到“首义”一词,然只是提及1912年初孙中山对武昌首义的认可,缺乏对民初以来“首义”这一概念演变过程的探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首义”为视点,以1910年代至80年代为视域,在爬梳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呈现“首义”一词的历史演变过程,推动相关概念史研究走向深入。

一、1910年代的“首义”归属

民初的1910年代,因帝制思想仍存,社会缺乏民主共和的观念,出于拥护共和体制的需要,武昌起义之后的云南起义、马厂誓师等“再造共和”义举也被提高到与“武昌首义”相类的地位,且以“首义”相称。

(一)称武昌起义为首义

1910年代提及武昌首义的主要与政治相关,少量的反映当时的教育和经济方面。

政治方面:

1912年,即武昌起义后的次年,多次提及武昌首义。政府公报方面,1912年武昌黄笃友等人

[收稿日期]2022-08-22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李飞涛(1997-),男,河南省汝阳县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 曹波、胡伟:《辛亥首义功臣熊秉坤评传》,《中国纪念馆研究》2015年第1辑,第209-216页。

② 杨智:《弘扬首义精神 勇担历史使命》,《湖北政协》2021年第10期,第17-18页。

③ 冯天瑜:《为辛亥辑史料 为传记开生路——〈辛亥首义百人传〉点评》,《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95-96页。

④ 王春雷:《清末武汉工商业的现代性与辛亥首义》,《北方论丛》2011年第5期,第76-79页。

⑤ 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名辨》,《江汉论坛》2011年第4期,第5-8页。

发《武昌黄笃友等呈大总统暨致国务院等电》,称“鄂军首义民国肇基,黎副总统望重环球,去留关系不轻”^①,希望黎可以留任原职,维持时局。在舆论界,1912年3月《申报》登载了《汉口蒋翊武电袁大总统各行政长官孙大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都督各军司令官各报馆钧鉴》,称“武昌首义翊武赞襄其间,力维大局……二十八号武昌乱机猝发人心惶惑,幸我副总统无恙秩序尚未大坏……翊武现力疾集齐军队,联合湘桂留鄂之师驻扎阳夏,镇压一切。如有不遵我副总统之命令及损失我副总统之威严者,惟以武装维持治安耳”^②。1912年3月《时报》刊登了一份南京公电,其记载到“武汉首义共和告成,民国初基肇于流血,饮水思源……特订三月十七日午后一时,开武汉死义诸烈士追悼公会”^③。1912年7月《申报》登载了《鄂省共和同盟两党之大决斗》,记述了“武昌首义共和党之力为多同盟会,系属后来近日成立鄂支部广收并蓄,势力颇厚,然人品则极形复杂,外界对于该会殊不满意,前日都督府开军事会议讨论襄阳军队善后事宜,共和同盟两党军界人物皆列席,两党不知何故忽大起冲突”^④,形象记载了鄂省党争之画面。1912年11月《申报》记载的《刘仲文比肩孙武》则记载了“武昌起义首功除孙武、邓玉麟等人外,尚有前北伐左军军统刘仲文……该员前后行绩,其功实不在武下,该员现虽解职,拟请查照孙武一例酬庸”^⑤。舆论界提及武昌首义的以《申报》《时报》为代表。

1912年之后,提及武昌首义的集中体现在《申报》。1914年4月《申报》记载了黑龙江的护军使朱庆澜和四川省公民杨雋先后呈请大总统文,“前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历官山西、河南擢至川滇边务大臣,皆能克举其职,及任川督以后,值武昌首义滇黔相应,该故督将政权交归士绅自治商

定条件。于辛亥十月初六日退职,初七日悬挂国旗,公明退读赞成民国,人无异议,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⑥。1916年4月21日唐雨钦的《敬告吾同胞同学》记载到,“吾国于东亚神州号称文明古国,奈以颓风积习致演成今日不能与列强并列地位,幸于辛亥武昌首义推翻专制组织共和。民国成立以来,各省民气渐次舒张,百端要政相率继举,如果力图进行不难称富强于东亚。……自启灭亡政府财乏兵穷,尚不知自行检举,痛悔前日之非,乃尤以中国矿产抵借款四千万用为战斗之资挥霍之品,其意将使吾同胞同志一网打尽,遂其私愤以为快,国家前途非所顾及……”^⑦,请求美国出于公道人心能够中止借款,使南北战事早日解决,四千万的借款可用来整顿实业,不致像波斯那样借外债而亡国,法兰西借外债丢失国家尊严。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意欲变更国体之际,孙中山发表的《孙文宣言》道,“文持三民主义廿有余年,先后与国人号呼奔走,期以达厥志,辛亥武昌首义与响应之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亿同胞之心。……袁氏果于是时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文于是痛心疾首,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疵”^⑧。1917年6月,黎、段发生“府院之争”,徐绍桢发文《徐绍桢望张勋公正解决》:“近日远近谣传竟有谓此中含有复辟思想,希冀非常者固料诸公之明决不出此。夫辛亥之役民党非有巨大之兵力也,而武昌首义各省皆闻风著应,不数旬而共和国体成立,论者已谓其易。今岁俄国革命乃一举而成功,视辛亥为尤易,足见地球上民心之趋向共和日甚一日。若谋复辟,即使能成事实亦必不能饜民心。……日前大总统命令召张督军入都

① 黄笃友等:《武昌黄笃友等呈大总统暨致国务院等电》,《政府公报》,1912年8月29日第121号第4册第735页。

② 蒋翊武:《汉口蒋翊武电袁大总统各行政长官孙大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都督各军司令官各报馆钧鉴》,《申报》,1912年3月3日第14018号,第2版。

③ 《公电》,《时报》,1912年3月11日,第4版。

④ 《鄂省共和同盟两党之大决斗》,《申报》,1912年7月7日第14143号,第3版。

⑤ 《刘仲文比肩孙武》,《申报》,1912年11月7日第14265号,第6版。

⑥ 《优待赵尔丰之呈批》,《申报》,1914年4月14日第14789号,第6版。

⑦ 《敬告吾同胞同学》,《申报》,1916年4月21日第15512号,第11版。

⑧ 孙中山:《孙文宣言》,《申报》,1916年5月9日第15530号,第11版。

为平和解决之计,责任所在应有公正办法以饜吾民之望”^①,在1914-1916年间,《申报》多次将首义归之于武昌起义。

教育、经济方面:

教育方面,1913年3月7日临时稽勋局发布通告,对于那些因武昌首义而中断学业的学子提出了使其继续接受教育的方案:“窃自武昌首义,六合景从”,“莘莘学子辍学来归”,“往往不能自由回堂”继续学业,“出力者反致失学之虑”。故规定,“凡中央及各省大学专门高等中小学校等,嗣后对于烈士后裔及革命异常出力人员,贫苦不能自给者,持有本局证书,一律准免学费,按其程度分配何校何级,但学校以国立及各省官立者为限,私立学校不在此例。”“自前年起义以后,学生中途辍业亲赴各地运动革命至今,格于成例不能返校者,嗣后各校对于此种学生验明本局证书,一律准其续学,但学级高下,应听各校按程度分配,不得稽口有功要求升级,以上办法于育材酬庸及国家财政各方面均有裨益而无妨碍”^②。这是教育领域中将武昌起义确定为首义。

经济方面,1912年8月《申报》报道了“武昌首义之都财政困难山穷水尽……尔等趁光复时括得官款与私款存放于外国银行者,果能保留作子孙之计乎”^③。这是经济领域将武昌起义确定为首义。

由上可知,1910年代与武昌首义相关的报道,主要侧重于政治方面,教育、经济等其它方面的很少。

(二)称云南起义为首义

1910年代对云南首义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社会动员、纪念日的设置与节日纪念三方面。

社会动员:

1915年12月23日,唐继尧、任可澄联名发出《云南首义致北京政府请永除帝制拥护共和并严惩杨度孙毓筠诸人电》,谴责袁世凯在筹安会等人的策划下背弃誓言不顾民意,停止国会废除约法,复辟帝制,要求严惩杨度等人^④。1916年,《云南首义通告各省请同伸义愤拥护共和电》称:“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内安外攘两穷于术……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⑤。1916年《义声日报汇刊》刊载的《云南首义饬各军队照常办事并切实保护外国教堂教士等电》记述了国体问题发生后全国上下人心惶恐,又有外人干涉、五国警告,云南当局特令各师长等“务各照常办事禁绝浮言,各保地方之治安……至于内地之外国教堂教士以及游历外人、各口岸外商,尤当督饬所属照约切实保护,毋得稍有疏失致碍邦交”^⑥。同期的还有《滇黔举义通告各省共兴义举请勿存心观望坐误机宜电》,号召其他省份凡食民国之禄者,响应起义,“戮力同心划除帝制”^⑦。《滇黔举义诸公致驻各国公使务望同伸义愤电》则记载了唐继尧等云南首义领导人号召中国公使一同伸张义愤,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⑧。上述多为从倡导反对袁世凯称帝逆行方面强调云南反袁为首义。

纪念日的设置:

1916年11月25日《参议院公报》公文记载众议院咨送由国会议员段雄等提议“恢复南京政府成立及南北统一两纪念日并增加云南首义纪念日”,并提出“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初十日为国庆日,应举行之事如左:一放假休息,二悬旗结

① 徐绍桢:《徐绍桢望张勋公正解决》,《申报》,1917年6月14日第15923号,第6版。

② 《临时稽勋局通告》,《政府公报》,1913年3月7日第299号,第11册,第211-212页。

③ 《武昌首义之都财政困难山穷水尽》,《申报》,1912年8月1日第14168号,第9版。

④ 唐继尧、任可澄:《云南首义致北京政府请永除帝制拥护共和并严惩杨度孙毓筠诸人电》,《义声日报汇刊》1916年第1期,第1-2页。

⑤ 《云南首义通告各省请同伸义愤拥护共和电》,《义声日报汇刊》1916年第1期,第2-4页。

⑥ 《云南首义饬各军队照常办事并切实保护外国教堂教士等电》,《义声日报汇刊》1916年第1期,第4-5页。

⑦ 唐继尧、蔡锷、刘愿世、任可澄、戴戡:《滇黔举义通告各省共兴义举请勿存心观望坐误机宜电》,《义声日报汇刊》1916年第1期,第6-9页。

⑧ 唐继尧、蔡锷、刘愿世、任可澄、戴戡:《滇黔举义诸公致驻各国公使务望同伸义愤电》,《义声日报汇刊》1916年第1期,第8页。

彩,三大阅,四追祭,五赏功,六停刑,七恤贫,八宴会”^①。1916年12月10日《政府公报》刊登的《西安省议会来电(十二月六日)》请求设立云南首义纪念日,“大总统国务院钧鉴:云南首义恢复共和与武汉革命事迹同一,恳请援照武昌成案以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②。1916年12月19日《时报》登载“云南首义日定二十五日,由参院议决”^③。议案得到通过,在次年12月24日《军政府公报》登载了“大元帅令:本届十二月二十五日为民国四年云南首义国庆日,致祭诸先烈派代理参军长黄大伟前往代行致祭,此令”^④。对设立云南首义纪念日也有不同声音,如1916年12月10日《申报》刊载的《童杭时请加国会纪念日》,“又提出修正案加入国会开幕之日即阳历四月初八日为纪念并改云南首义四字为云南倡议拥护共和”^⑤,他认为理由有二,其一为使国民重视国会,避免权奸推翻国会,尊重国会起见,加入国会开幕纪念日。其二云南倡议共和时,袁世凯的洪宪纪元尚未公布,民国还是一直存在并未中断,如果采用云南首义一词,则会被认为以前的民国中断,易因词语不明引起歧义,因此云南倡议拥护共和较云南首义更为准确。最终,云南首义纪念日的时间定为每年12月25日,云南首义拥护共和纪念日和云南首义纪念日都得到接受。

节日纪念:

1916年12月9日《申报》载文《庆祝云南首义期预志》称,“本埠南北商会、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教育会及救火联合会、上海商团筹备处、市立私立大中小男女各学校均于是日恭行庆祝典礼,

并闻救火联合会、商团筹备处与各学校于是晚举行提灯会以庆共和,想是日定有一番热闹也”^⑥。1916年12月24日《申报》载文《江北鳞爪(冷香)》记载了在云南首义纪念日举行庆祝典礼,各学校放假一日^⑦。同一天《申报》载《三志滇军起义之纪念日》报导了云南首义纪念日,“本埠政学绅商各界预备举行庆祝”^⑧。1916年12月25日《申报》刊载《云南首义纪念日感言》质问道,“要而言之,皆为各自争其所争,议其所议,以群趋于权力之途而已,然则云南誓师时之人格主义,不几无人尚有所念之遗留耶?”^⑨同一天《申报》登载的《云南首义纪念之庆典》则报道了庆祝节日的相关政令^⑩。1916年12月26日《申报》载《云南首义纪念日之庆祝盛况》,分别报道了《道尹公署之礼节》《交涉公署之热闹》《衙署学校之兴趣》《提灯游行之路径》《工人军人之休息》《黄埔江头之光辉》^⑪等内容。1917年1月5日《申报》登载的《粤垣庆祝首义纪念日情形》,报道了上个月25日粤省各界庆祝云南首义之情形^⑫。1917年1月7日《申报》登载的《滇垣首义之纪念日》报道了在云南首义纪念日滇省各界设立为期五天的庆祝大会,在23日军政学绅各界人物“均于是日午前十时集齐城内忠烈祠行礼,军警界着制服,政学绅商着常礼服行礼。毕至南城外忠烈祠对拥护共和阵亡官兵灵位行敬礼,警军界行举手礼,政学绅商行脱帽一鞠躬礼,读祭文毕后,行礼放爆竹而散。”^⑬云南首义被推为节日而予以纪念。

由上可知,在1916、1917年有关云南首义的报道相形较为集中,在1910年代占据重要地位。

① 《众议院咨送恢复南京政府成立及南北统一纪念日并增加云南首义纪念日请议决文(十一月二十五日)》,《参议院公报》,1916年11月25日第2期,第19册,第63-64页。

② 《西安省议会来电(十二月六日)》,《政府公报》,1916年12月10日第336号,第98册,第332页。

③ 《国内专电》,《时报》,1916年12月19日,第2版。

④ 《大元帅命令》,《军政府公报》,1917年12月24日第36号,第1页。

⑤ 《童杭时请加国会纪念日》,《申报》,1916年12月10日第15745号,第6版。

⑥ 《庆祝云南首义期预志》,《申报》,1916年12月9日第15744号,第10版。

⑦ 冷香:《江北鳞爪》,《申报》,1916年12月24日第15759号,第7版。

⑧ 《三志滇军起义之纪念日》,《申报》,1916年12月24日第1579号,第11版。

⑨ 步陶:《云南首义纪念日感言》,《申报》,1916年12月25日第15760号,第7版。

⑩ 《云南首义纪念之庆典》,《申报》,1916年12月25日第15760号,第10版。

⑪ 《云南首义纪念日之庆祝盛况》,《申报》,1916年12月26日第15761号,第10版。

⑫ 《粤垣庆祝首义纪念日情形》,《申报》,1917年1月5日第15770号,第6版。

⑬ 《滇垣首义之纪念日》,《申报》,1917年1月7日第15772号,第6版。

(三)称马厂誓师为首义

1910 年代后期提出马厂首义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设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为民国纪念日一事上,其余的则是少量的纪念日庆祝活动。

1919 年《参议院公报》第一期第 6 册公布了参议院的《咨大总统咨达众议员王伊文等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一案业经院议可决文》:“参议院为咨达事准众议院咨开,据本院议员王伊文等提出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一案,于一月十八日开会提付院议,多数可决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查修正国会组织法第十三条,民国议会之议定以两院之一致成之,此案既经本院议决相应抄录原案全文,咨请贵院查照议决等,因到院经于本月二十三日提付大会讨论,照原案通过。兹依议院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除咨复众议院外,相应咨请大总统查照办理可也”^①。同年《政府公报》第 1083 号公布“大总统令:国会议决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为民国纪念日,兹公布,此令。”^②援例云南首义拥护共和纪念日,马厂首义被北洋政府定为再造共和之民国纪念日。相关的纪念活动有 1919 年《政府公报》第 1225 号的《印铸局通告》:“本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本局发行之政府公报于四日停刊一天,特此通告。”^③1919 年 6 月 18 日《时报》登载的《杭州快信》,报道了“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经新国会议决为民国纪念日,文武各机关均应放假一天以作纪念。”^④

在 1910 年代,从时间上来说,武昌首义贯穿始终,云南首义、马厂首义处于中后期。从所掌握的民国报刊资料对“首义”的报道来说,对云南首义的报道相对较多,武昌首义次之,马厂首义最少。因此在这个时期“首义”地位的归属不具有

指向性,“共和”是时代的潮流。

二、1920 年代及之后对武昌首义的认同

1920 年代及之后有关武昌首义的报道升至首位,云南首义在 20—40 年代与武昌首义相伴随,作为国家纪念日延续到 40 年代,马厂首义则仅见于 20 年代初期。从舆论界对“首义”的报道变化,可以看出武昌首义的地位历经了 1910 年代的首义“之一”,20—40 年代的首义“第一”,到之后的首义“唯一”。

(一)武昌首义地位之凸显

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武昌起义的首义地位之凸显,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设立武昌首义纪念组织和场所

设立武昌首义纪念组织和场所主要包括武昌首义纪念会、武昌首义公园、武昌首义大学等。

组织武昌首义纪念会:1922 年 12 月 11 日《时报》刊载《武昌组织首义纪念会》道,“武昌起义退职军人,拟组一首义纪念会,已得萧耀南同意,现推吴兆麟为筹备主任,进行一切”^⑤。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23 年 12 月 22 日吴兆麟报告了筹备结果:“窃以武昌为首义之区亦即为民国发祥之地,律以饮水思源之义则重民国者必思所以重武昌纪元……同人等不揣固陋,由发起而筹备,粗具端倪,即于本年十一月五日假武昌城内抱冰堂召集大会,提议倡办纪念大学、公园附纪念碑铸、张文襄公铜像、功裔教养所附幼稚园、伤军养济院附工厂以及其他足为首义之纪念者逐项讨论一致赞同,至于经费一节除临时费暂由同人等分别挪垫外,所有经常费用亦决定方法有二,(甲)募捐(乙)提拨固有基金,一俟储有的款即酌量情形次第举行”^⑥。同年《华国》月刊报道了章炳麟撰写的《武昌首义纪念宣言书》^⑦。

① 《咨大总统咨达众议员王伊文等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一案业经院议可决文》,《参议院公报》,1919 年第 1 期第 6 册,第 194 页。

② 钱能训、龚心湛、靳云鹏:《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9 年 2 月 8 日第 1083 号,第 139 册,第 151 页。

③ 《印铸局通告》,《政府公报》,1919 年 7 月 3 日第 1225 号,第 145 册,第 73 页。

④ 《杭州快信》,《时报》,1919 年 6 月 18 日,第 4 版。

⑤ 《武昌组织首义纪念会》,《时报》,1922 年 12 月 11 日,第 2 版。

⑥ 《公函二:武昌首义纪念事业筹备处主任吴兆麟等报告倡办武昌首义纪念筹备经过情形函(十二月二十二日)》,《参议院公报》,1923 年 12 月 22 日第 3 期第 3 册,第 26 页。

⑦ 章炳麟:《文录二首:武昌首义纪念宣言书》,《华国》,1923 年 11 月 15 日第 1 卷第 3 期,第 1 页。

建立武昌首义公园:1924年2月20日《时报》刊登了《武昌首义公园已成立》的消息,计划于1924年的元宵日举行开幕式,其在前清署臬司衙署乃园的基础上加以修复点缀而成,其“位于蛇山之首,面临长江与鹦鹉洲、晴川阁隔江相对,树木环荫并有大汉皇帝陈友谅之墓”^①。武昌首义公园建成后因其优美的园内环境成为时人游历的地点之一,许多园内环境、建筑等发表于报刊,如1925年《联益之友》刊登的陈云三的《武昌首义公园:[照片]》^②,同年《社会之花》刊登的戴行遥的《武昌首义公园风景之一:[照片]》^③,1927年《妇女杂志(上海)》刊登的张昌炎的《武昌风景:武昌首义纪念坊:[照片]》^④,1929年《华北画刊》刊登的鄢烈魁的《武昌首义公园内之纪念坊:[照片]》^⑤,1932年《抗争:外交评论》刊登的《武昌首义公园:[照片]》和《武昌首义公园总理纪念碑:[照片]》^⑥,1933年《儿童杂志中级》刊登的《图画:武昌首义公园中的总理纪念坊》^⑦等等。

筹建武昌首义大学:1947年《科学》报第29卷第12期刊登了《国内消息:武昌首义大学》:“武昌首义大学筹委会,10月19日下午举行会议,公推居正为校长,程潜为董事长,万耀煌,何成濬为副董事长。并成立:(1)基金筹募委员会,推方觉慧为主委,徐源利,夏斗寅副之;(2)校舍建筑委员会,推夏斗寅为主委,秦春萱,李西客,胡祖舜,王文俊为委员。基金预定一百亿,由鄂省府担任40亿,余向武汉各界募集。”^⑧

无论是纪念会还是公园、大学,都是对武昌起义首义地位的推崇。

2. 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历史纪事

1922年10月10日国庆纪念日潘文安发表《国

庆纪念与共和精神》一文,在国庆纪念日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去哪了的疑问,人民所期盼的七项民主自由权力“来何容易,何一不自洒热血捐生命艰难困苦以换得者也,曾几何时而袁氏盗国且盗约法不知不觉将吾民所日夕祷祀艰难争得之自由权轻轻剥夺荡焉无存,而吾国民又善忘淡然熟视若无睹,此吾所大惑不解而不能忽然者”^⑨。民众善忘就需要历史书写来构建历史记忆,关于武昌首义历史纪事的文章在20年代中后期显著增加。如1925年10月10日的国庆日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黄写的《十四年来战争之回顾》,对比世界各文明国家在国庆日的兴高采烈而吾国则“日在愁云惨雾水深火热之中,除官厅悬灯结彩稍事庆祝外,而国民方面反多唏嘘感慨不能自己”,列举了十四年来大大小小的战争,“战争既如是之多而且烈,则对于各种类之战争不能不切实鉴别公正平衡,以端军人之趋向而正国人之视听。辛亥之役武昌首义推倒历代专制建造五族共和,其流血为有代价之流血,其战争为有意义之战争,孙黄二公实建不朽之业、不世之功,无论何人不能磨灭”^⑩。1929年的国庆纪念日湖北省政府刊登的《国庆纪念武昌总主席熊委员秉坤报告辛亥首义情形》^⑪,对于补充历史细节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1930年10月12日《宜兴民众》刊载了《武昌首义的历略》,简要叙述了武昌首义的经过^⑫。

三四十年代后先后经历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之久的解放战争,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武昌首义相关的纪念活动减少,有关的历史纪事也出现时间断层,主要的有1936年谢楚珩发表了《武

① 赞:《武昌首义公园已成立》,《时报》,1924年2月20日,第15版。

② 陈云三:《武昌首义公园:[照片]》,《联益之友》1925年第6期,第2页。

③ 戴行遥:《武昌首义公园风景之一:[照片]》,《社会之花》,1925年第2卷第20号。

④ 张昌炎:《武昌风景:武昌首义纪念坊:[照片]》,《妇女杂志(上海)》,1927年5月1日第13卷第5号。

⑤ 鄢烈魁:《武昌首义公园内之纪念坊:[照片]》,《华北画刊》,1929年7月28日第29期,第3版。

⑥ 《武昌首义公园:[照片]》《武昌首义公园总理纪念碑:[照片]》,《抗争:外交评论》,1932年第1卷第24期。

⑦ 《图画:武昌首义公园中的总理纪念坊》,《儿童杂志中级》1933年第25期,第31页。

⑧ 申:《国内消息:武昌首义大学》,《科学》,1947年12月第29卷第12期,第377页。

⑨ 潘文安:《国庆纪念与共和精神》,《申报》,1922年10月10日第17828号,第54版。

⑩ 李宗黄:《十四年来战争之回顾》,《申报》,1925年10月10日第18899号,第46版。

⑪ 《国庆纪念武昌总主席熊委员秉坤报告辛亥首义情形》,《湖北省政府公报》,1929年10月16日第67期,第47-49页。

⑫ 《武昌首义的历略》,《宜兴民众》,1930年10月12日第38期,第2页。

昌首义业谈》，总结了武昌首义有关的“湖北军队之组织”“湖北军中之教育”^①“革命团体之组织”^②的历史经验。1936 年余克敏在《青年战士》上发表《辛亥武昌首义之真像》，“值此国庆瞬息，国难严重之际，念缔造之匪易，固圉之有责，略就平日钻研革命史之所得，将武昌首义的真像写出，藉供参证焉”^③。1936 年华国柱在《时代周报》上登载《时代史话：武昌首义者熊秉坤》一文，探究武昌首义者是黎元洪还是熊秉坤^④。与此相关的还有 1937 年《中兴周刊（武昌）》发表的《辛亥武昌首义史之一》，论述了黎元洪在武昌首义中的表现，批驳章太炎认为黎元洪是武昌首义者^⑤。此外也有武昌首义革命英烈个人史的文章，如 1936 年 5 月 22 日《申报》发表的《中宣部印发胡故主席事略》，1937 年 3 月 15 日《申报》发表的《庚子烈士唐才常等公墓落成汪撰碑文历述举义经过》，1943 年张镜影在《三民主义半月刊》上发表的《武昌首义殉难彭刘杨三烈士列传：附表格》等等。

编撰武昌起义历史，本身就是对其首义地位的认同。

3. 追祭武昌首义烈士，抚恤伤残兵员

1923 年 2 月 19 日《时报》刊登《首义伤兵要求抚恤》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伤兵五十七人，均以战事致断臂折足，黎总统在湖北都督任内，特颁终身养老条例，后当局改为三年……省教育会干事常会中，均以该伤兵等为首义牺牲，饮水思源，当受终身抚恤条例，已决电政府请恢复前议。一面向各慈善团体筹款项暂维生活，一面并函

本埠各同乡团体，请为设法代谋生活机会”^⑥。1924 年 9 月 1 日《时报》报导了“武汉首义诸人前因辛亥之役诸先烈死于阳夏战争殊堪悯恻，特请萧耀南捐洋一千元在大东门外龙华寺请僧追笃二十日为诵经，届满之期，萧特往进香。”^⑦1929 年《中央周报》刊登了《辛亥武昌首义诸烈士遗像》^⑧，有陈希吾烈士、刘六符烈士、蔡济民烈士、林方尘烈士、彭楚藩烈士、林黄廛烈士、刘复基烈士、陈愈心烈士。1930 年 4 月 1 日《金刚钻》刊登了辛亥首义伤军委员会于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正式举行改选大会，各机关团体派代表参加，何正方等七人当选为委员^⑨。1931 年《平汉日刊》第一期刊登了平汉铁路管理局的复首义伤军筹赈委员会函，记载了代销入场券二十张退还八十张希查收并制给收据^⑩。同年《军政府公报》第 102 号刊登了何应钦部长批准的辛亥首义铁血伤军代表徐金榜等人呈送的首义伤军名册请发恤饷由^⑪。《湖北教育厅公报》刊登的厅长黄健中批准的辛亥首义阵亡将士遗族抚恤委员会事务主任许星发呈请的请补遗孤生袁泽汉优待费额由^⑫。1935 年《嘉善县政府公报》第 24 期刊登政府训令，令县公安局各公安分局通飭各局劝募重修辛亥首义烈士坟墓捐款^⑬。1936 年 10 月 6 日《申报》刊登《国府褒扬先烈蒋翊武》，“先烈蒋翊武志行卓犖，隶属同盟，组织学社，宣传革命，武昌首义，躬统师干，促成共和，厥功懋著。嗣于民国二年，讨袁事败，殉义桂林，大义昭然，殊深軫悼，特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追念忠盖之意”^⑭。

与武昌起义人员相关的追祭与抚恤，也体现

① 谢楚珩：《武昌首义业谈（一）》，《笔锋》，1936 年第 1 卷第 1 期，第 24—25 页。

② 谢楚珩：《武昌首义业谈（二）》，《笔锋》，1936 年第 1 卷第 2 期，第 14—15 页。

③ 余克敏：《辛亥武昌首义之真像》，《青年战士》，1936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8 页。

④ 华国柱：《时代史话 辛亥武昌首义者熊秉坤》，《时代日报》，1936 年 3 月 26 日，第 2 版。

⑤ 《辛亥武昌首义史之一》，《中兴周刊（武昌）》，1937 年 4 月 25 日第 7 卷第 15 号，第 13—15 页。

⑥ 《首义士兵要求抚恤》，《时报》，1923 年 2 月 19 日，第 6 版。

⑦ 赞：《小专电》，《时报》，1924 年 9 月 1 日，第 2585 号。

⑧ 《辛亥武昌首义诸烈士遗像》，《中央周报》，1929 年 10 月 10 日第 70 期，第 4 册，第 140—141 页。

⑨ 宣：《辛亥首义伤军委员会》，《金刚钻》，1930 年 4 月 1 日，第 2 版。

⑩ 平汉铁路管理局：《公函：复首义伤军筹赈委员会函》，《平汉日刊》，1931 年 1 月 29 日第 1 期，第 3 页。

⑪ 何应钦：《军政部批：衡字第三一八八号》，《军政公报》，1931 年第 102 号，第 68 页。

⑫ 黄建中：《批：教字第三七七七号（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湖北教育厅公报》，1931 年 8 月 15 日第 2 卷第 15 期，第 15 页。

⑬ 杨占春：《嘉善县政府训令：第一六三一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1935 年 2 月下旬第 24 期，第 3 页。

⑭ 《国府褒扬先烈蒋翊武》，《申报》，1936 年 10 月 6 日第 22786 号，第 4 版。

了对武昌首义地位的认同。

以上三个方面的相关报导,十分丰富,显现出武昌起义首义地位的日渐凸显。

(二) 云南首义与马厂首义的有关报道

在20世纪20-40年代,亦有云南首义与马厂首义的报导。

云南首义:

在20年代,1926年12月25日《大世界》刊载了《云南首义纪念》,感叹中国的国庆纪念、国耻纪念很多,加上云南首义纪念日恐更多,“但照理论上说来,国庆是一件可贺的事,不可少却。国耻虽是一件可愧的事,更不可忘掉……而今以后,我望我们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止戈为武的大纪念,那头疼脑胀的国耻纪念,固须谢谢,就是说到庆典,我看倒是莫大于兵气销为日月光啦。我国民是酷好和平的,大家以为何如”^①。1928年12月25日《时报》刊登的《旅滇滇人举行云南首义纪念》记载了在云南首义拥护共和的十三周年之际,“旅滇滇人,以该省于十三年前之今日,独以一省之力,高举义旗,兴师讨袁。卒能推翻帝制,再造共和,使中华民国起死同生,实由该省牺牲无数之头颅与金钱而得来。今当十三周年纪念,又为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之第一次纪念日,并以该省政府,预定是日在滇举行大规模之运动会,为热烈庆祝,故旅滇滇人亦相约于今日在沪开会庆祝,以资纪念云”^②。1929年《图画时报》第531期刊登了孙季康拍摄的为纪念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之十三周年,省政府龙主席及各委员组织的军警学联合运动大会上的镜头:(1)高级中学自由车表演(2)省立女中团体游戏。^③

在30年代,1935年12月25日《时报》刊登的《云南首义纪念银钱业休业》,记载了上海市银

钱业在本月25日云南首义之日休假一天,“是日收解,概归次日照理”^④。1936年《中央周报》刊登了李烈钧发表的《云南首义之回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烈钧在文中列举了云南为何能够爆发反袁首义的三条重要原因,并警示国人“特必须立大志,鼓大勇,树信用,重大节,养成打虎精神,更效先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博爱精神,实行民权,运用民力,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虎市蜃楼,夫何足异”^⑤。同年《中央党务月刊》第101期刊登了中央党部于廿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云南起义纪念活动,“由李委员烈钧主席,领导行礼如仪后,即由李委员报告起义经过及纪念之意义,至九时三十分礼成散会”^⑥。同年《文化建设》月刊第2卷第4期刊登了李烈钧的《云南首义廿周年纪念日咏史》,包括七律一章和七绝一首^⑦。

在40年代,1940年的《清真铎报》刊登了马伯安的《云南护国首义二十三周年纪念感言》,其叙述了云南首义之史实,结合当时国难当头的形势,给出了三条救国的建议,“此则吾人于追怀护国纪念之日,所愿一本匹夫有责之义,略贡所见,以就教于邦人君子,知我罪我,非所计也”^⑧。1944年《政建》刊第5卷第2期所载的《云南首义:拥护共和纪念》一文,赞扬蔡松坡兴首义之师,拥护“共和”,“精神不死”^⑨。

综观20-40年代,有关云南首义的记载接续刊出。

马厂首义:

马厂首义的记载集中在20年代初。1920年《北京大学日刊》第649期发布《本校公告》:“校长布告:本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照

① 龙川居士:《云南首义纪念》,《大世界》,1926年12月25日,第2版。

② 《旅滇滇人举行云南首义纪念》,《时报》,1928年12月25日,第5版。

③ 孙季康:《上月廿五日云南首义拥护共和之十三周年纪念省政府龙主席及各委员组织军警学联合运动大会》,《图画时报》,1929年1月20日第531号,第1页。

④ 《云南首义纪念银钱业休业》,《时报》,1935年12月25日,第3版。

⑤ 李烈钧:《云南首义之回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周报》,1936年12月25日第33期,第167页。

⑥ 《云南起义纪念》,《中央党务月刊》,1936年12月25日第101期,第1273页。

⑦ 李烈钧:《云南首义廿周年纪念日咏史》,《文化建设》,1936年1月10日第2卷第4期,第134页。

⑧ 马伯安:《云南护国首义二十三周年纪念感言》,《清真铎报》,1940年7月1日,新2号第3页。

⑨ 若萍:《云南首义:拥护共和纪念》,《政建》,1944年12月25日第5卷第2期,第16页。

章应放假一天,此布”^①。1920 年 6 月 29 日《申报》刊登的《预志再造共和之纪念》,记载了“上海地方审检两厅,张梅两厅长昨发出会衔布告云。为布告事,照得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本两厅遵例停止办公一天,仰诉讼人等一体知悉,特此布告”^②。1922 年 7 月 2 日《申报》刊登的《庆祝再造共和之纪念》一文,记载了“沪宁沪杭甬两路管理局,昨奉交通部电,云准内务部咨开本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各机关应停止办公一天,藉伸庆祝等……并飭各车站一律悬旗志庆”^③。同年 7 月 3 日《申报》登载了江苏高等审判厅和江苏高等检察厅发布了在马厂首义纪念日放假一天的公告^④。同年 7 月 4 日《时报》刊载的《杭州快信》记载了“今日(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本省军政警各机关暨各学校团体,均应放假一天,并悬旗志庆”^⑤。同日《申报》刊载的《再造共和之纪念》,记载了“昨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纪念日,本埠政法各官厅均停止办公悬旗志庆。公私立各学校亦放假一天以志纪念。法公廨昨日厅讯刑事堂期,亦因再造共和纪念由中西谳员知照法捕房刑事科停讯琐案一天”^⑥。1923 年 7 月 4 日《申报》登载了《恢复共和之纪念》,记载了在马厂首义恢复共和纪念日,“城内各公署各机关门前都叉国旗,停止办公一天,学校方面以暑假在即停课者不多,华商电车均悬小国旗四面以为纪念,惟商界则无甚举动”^⑦。1924 年 7 月 4 日《申报》刊载的《再造共和纪念日状况》,记载了在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各机关均升旗庆祝,县署布告全日停止办公,市立各小学亦放假一天,惟工商界未有表示”^⑧。1926 年 7 月 4 日《申报》登载了《昨日再造共和纪念情形》,

记载了在马厂首义纪念日“本埠各官厅署,除皆循例停止办公外,并在各厅署内悬升国旗……又上海总商会附设之商业图书馆昨日(三日)因系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特停止阅览一天以表庆祝而志纪念”^⑨。

在 20 年代至 40 年代有关云南首义的报道集中在节日的庆祝和弘扬云南首义精神方面,关于马厂首义的报道较少,可见于 1920 年代初期,集中在节日放假庆祝上。

(三)武昌首义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辛亥武昌首义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肯定,武昌首义的历史地位也得到了确定。有关武昌首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可以从新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一窥究竟。

1956 年 9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参加辛亥革命首义老人 编撰武昌首义史料》的消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该报第一份有关武昌首义的报道,记载了当时武昌市参加辛亥革命的一批首义老人,正在编撰一部记载武昌首义史实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资料汇编”^⑩。之后有关武昌首义的报道主要是在 80 年代,如 1981 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叶剑英为武昌首义纪念碑和起义门题字》一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亲笔题字,将分别镌刻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的青色碑身上和起义城门的花岗岩匾额上,并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和起义门作了简要介绍^⑪。同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在武昌建成》的消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 31 日在武昌蛇山首

① 《本校公告:校长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 年 7 月 2 日第 649 号,第 2 版。

② 《预志再造共和之纪念》,《申报》,1920 年 6 月 29 日第 17010 号,第 10 版。

③ 《庆祝再造共和之纪念》,《申报》,1922 年 7 月 2 日第 17728 号,第 14 版。

④ 《江苏高等审判庭:布告》《江苏高等检察厅:布告》,《申报》,1922 年 7 月 3 日第 17729 号,第 16 版。

⑤ 《杭州快信》,《时报》,1922 年 7 月 4 日,第 5 版。

⑥ 《再造共和之纪念》,《申报》,1922 年 7 月 4 日第 17730 号,第 13 版。

⑦ 《恢复共和之纪念》,《申报》,1923 年 7 月 4 日第 18086 号,第 13 版。

⑧ 《再造共和纪念日状况》,《申报》,1924 年 7 月 4 日第 18444 号,第 12 版。

⑨ 《昨日再造共和纪念情形》,《申报》,1926 年 7 月 4 日第 19158 号,第 13 版。

⑩ 新华社:《参加辛亥革命首义老人 编撰武昌首义史料》,《人民日报》,1956 年 9 月 8 日第 4 版。

⑪ 新华社:《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叶剑英为武昌首义纪念碑和起义门题字》,《人民日报》,1981 年 8 月 1 日第 4 版。

义公园建成……碑身正面是叶剑英题写的碑名。镌刻在碑座大理石上的碑文,叙述了以武昌为首义之区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在东方出现第一个共和国的经过,热烈地赞颂了孙中山先生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功绩。碑基两侧的花岗岩浮雕是两个系着飘带的花环,象征武昌首义中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①同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秋节前夕部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参加者的遗属烈属团聚 热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国祖国》,中秋节前夕,民革武汉市委员会邀请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参加者的部分遗属进行了茶话会,“大家在座谈中追忆了辛亥革命志士们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的情况……大家表示,一定要继承先辈们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茶话会上,辛亥革命遗属、烈属们都热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我们作为辛亥革命者的后辈,在这个节

日里十分怀念台湾同胞。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千万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能够应乎天理,合乎人情,为祖国的和平统一采取积极的行动。”^②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李先念会见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十位老人 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亲切问候》^③一文,等等。

80年代之后,有关首义的公众认知即指武昌起义,至于云南起义与马厂誓师,则渐渐湮没不闻了。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主要侧重于大众舆论层面而论,至于学术界的著述,无论是武昌起义还是云南起义、马厂誓师,均时有涉及,只不过较之于大众舆论,其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首义一词所属所指在武昌起义之后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910年代不具有特属,20-40年代则是武昌起义超越云南起义等独领风骚,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则渐渐成为大众认知。

[责任编辑:郭昱 王志跃]

① 新华社:《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在武昌建成》,《人民日报》,1981年9月3日第4版。

② 新华社:《中秋节前夕部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参加者的遗属烈属团聚 热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国祖国》,《人民日报》,1981年9月14日第4版。

③ 新华社:《李先念会见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十位老人 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亲切问候》,1981年10月11日第1版。